

印度经济自由化时期南部小农经济的增长和贫困

[作者]: [印] 梵姆·瓦库

对经济自由化时期,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农业人口的分配变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还(Eastwood and Lipton, 2000)。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经济模型以便分析经济自由化对国内不同群体(1998 and Storm, 2001),但是几乎没有关于经济自由化对欠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相对来说更加贫穷的农场主以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实际影响方面的论述。本文专注于这些问题。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南部Telangana地区农业部门荒谬的经济增长过程。

仅仅从增长表现来看, Telangana地区的农业已经做得相当好了(Vakulabharanam, 2003)。过增长率超过4.7%(Vakulabharanam, 2003)。而且这是发生在全球以及印度国内农业普遍不景气的(2003)。考虑到过去十年以来, Telangana最重要的农作物(非食物谷类作物)的真实产出价格一直存一事实, Telangana非食物谷类作物实际农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率就不是很容易能被理解的了。

在分配领域, NSS (National Sample Survey) 的数据表明, 该地区边缘农场主以及农业劳动者的福下降了。它还表明, 在1998至2002年期间, 超过1000名农场主在这次空前的自杀浪潮中自杀了(Chow实际农业产出的增长伴随着大部分农场主福利水平的下降(贫困的增加)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用了增长引致的贫困(growth-inducing distress)和贫困引致的增长(distress-inducing growth)这两个将对此进行详细的解释。这些概念被用来说明有关增长以及逐步增加的贫困的传奇故事, 我认为在经地区, 这两者已经相互地纠缠在一起。

一、自由化和农业

有关发展中国家自由化和农业的文献一直以来都是在两个对立的学派之间进行着激励的争辩。I地位的观念是欠发达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对于农业存在着政策偏倚(policy-bias)。产出的价格被水平。投入的价格由于补贴而被扭曲。他们认为, 纠正这种政策偏见的方法就是使得不发达国家的放, 并且从农业中取消种种不正确的价格激励。这就意味着需要采用三项政策命令: 取消全球价格和而允许国内价格上升; 取消农产品进口限制, 从而使得比较优势的机制能够促使土地等其他投入要素者不能成功地和进口产品相竞争; 最后, 取消补贴, 因为它趋向于使农业投入要素的价格发生扭曲(Krueger, 1992, and Gulati and Kelly, 1999)。

第二个学派对于上述大部分支持农业自由化的论点提出了质疑。首先, 他们认为当前农产品的平上进行的, 不发达国家农场主得到相当少的补贴, 而发达经济体的农场主得到的却是大量的补贴(Reddy, 2002)。其次, 他们对调整国内价格使之和全球价格更加接近会导致一个更加理性的对农业资; 疑。支持者争论说, 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价格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各国之间在总产出方面的比较优场的情况, 而剩余市场是由不同国家发送到全球市场上的相对而言较小的剩余和赤字所形成的。

本文的发现基本上支持第二个学派的观点, 即使考虑到Telangana这个例子的特殊性。

二、印度的农业自由化

当1991年印度开始着手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政策(stabilisation policies)以及世界银行的adjustment policies)时, 经济学家和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经济的开放度。即的度量指标(例如, 种子市场的开放、解除对肥料价格的管制)被引入到农业部门时, 农业依然很外。1994年, 印度在GATT多边协议下签署了Dunkel草案, 并且正式接受了农业协议(Agreement on /业贸易自由化。印度通向农业自由化的驾车在WTO的庇护下继续前进。

三、Andhra Pradesh的农业自由化

农业部的新策略具有以下特色。旧的以邦为中心的范例强调土地改革而补贴被取消掉了。出口导向型的农场业、农业的价值增加、通过改变租赁结构来合并土地所有权，以及公司资本对农为了许多其他实施表1中列出的各项改革的邦的领导者。在邦中引入的一些度量指标具有增加农场主优先，电力补贴已经被显著地削减了（Murthy, 2001）。政府年度支出中对农业补贴的比率从1991年的大约3%。就每公顷的影响而言，削减对那些小土地所有者所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Sen, 2000）。

总的来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自由化政策对于印度农业，特别是对于Telangana的农业来说其中，我从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Telangana地区寻找关于这些政策分配效应的经验证据。

四、自由化和分配

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最近的统计估计（Rao and Storm, 2003 and Deaton, 2003）指出了改革引入之前，农村地区农业产出和不平等停滞不前，而贫穷基本上以相同的比率在下降。虽然Telangana使得这个地区有点不同寻常，但是以下我将要描述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福利水平下降的故事就整个国家而言是普遍的（Sen, 2003）。

自由化期间边缘农场主和劳动者福利水平的下降

以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的土地所有权数据为基础，任何一个家庭主要可以被归为以下几类：自己经营自己经营非农业、被雇用于非农业及其他。利用最近的数据，我们能够识别出那些拥有土地，但却作为农业的家庭。

每一类家庭的人均支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出来：将每一类家庭的总支出除以每一类家庭的人均收入，1987-1988年，1993-1994年以及1999-2000年，我分别做了这些计算，同时作了通货膨胀修正。

通过这张表，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首先，Telangana和AP农村地区的人均支出在1983年和1993-1994年（自由化之前的时期）是上升的，而在自由化之后的时期内却大大地下降了。其次，自由化之后的时期内没有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大大下降，这倒成为早期他们经历收获这一趋势的一个扭转。第三，虽然大型农场主、中型农场主在自由化到来之后也经历了下降，但是他们福利水平的下降并没有我上面提到的两类人福利水平的下降。总的来说，在自由化期间，对于所有类型的家庭来说人均支出是下降的，而对于更加贫穷的部门来说这个

五、增长和贫困

增长过程的持续显然部分地是由于自由化的原因，但并不是农业自由化鼓吹者所说的那些原因。增长和贫困是相互引起的，我将澄清在引言中提到的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这和目击最高增长率的行业中自杀人数的自杀人数的事实是一致的。

六、增长引致的贫困

Telangana的增长过程可以被称之为“滞后绿色革命（lagged-green revolution）”。绿色革命技术主要是在Andhra Pradesh和Telangana地区之间。为了解释增长的过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投入方面以及下面就要描述的收益（每公顷的产出）成分是很明显的，它解释了过去三十年来获得的总增长的三分之二（Vakula, 2000）。这反映了增加使用的投入，例如HYV种子、肥料、杀虫剂、劳动力以及该地区的新技术。举例来说，化肥使用量从1969-70农业年的26393.4公吨上升到1999-2000农业年的540775公吨，而相同时期磷肥使用量则从1969-70农业年的1000公吨上升到1999-2000农业年的10000公吨（数据来自Season and Crop Reports of the State of Andhra Pradesh）。新的灌溉系统——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以便支持农业耕作的新方式。农业增长就是这些新方法的结果。

七、自由化期间增长引致的贫困

在自由化时期之前，当福利水平以及非食物谷类作物的价格提高时，生产者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是增加闲暇来替代劳动，并且耕种更多的非食物谷类作物。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投入要素的增加使用，上述的这一点。当非食物谷类作物的实际价格上升时，农场主也作出增加耕种面积的反应。然而，在非食物谷类作物的实际价格开始下降时，农场主仍然增加非食物谷类作物的耕种面积，从而导致一个负的福利效应。特别地，由于边缘农场主通常不能得到水田而只能耕种非食物谷类作物。而且，由图1可以看出，农场主成为粮食的净购买者，主要是这些边缘农场主以及劳动者，面临着更多的福利损失。为了应对福利损失，农场主增加了耕种的面积、劳动时间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使用。这是一个典型的Chayanovian机制。当生产者的福利水平下降时他们就趋向于用劳动/努力来替代闲暇。Chayanov发现农民总是在设法维持一个福利水平，即使在极端艰难条件下。

八、贫穷引致的增长

非食用农作物(产业)的不确定收入和上升的生产成本。

在表1中我指出了在过去十年非食用农作物销售价格的下降，然而对于这些农作物的累积收入可以以市场价格得到。

我使用Andhra Pradesh邦的统计摘要计算出棉花样本的总收入。尽管1995年以后棉花的产量在增加，随着销售价格的下降在下滑。

生产价格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渠道取得，可以由印度农业农作物价格委员会指导的耕作成本计划。棉花生产成本数据以显示在1985年~2000年生产成本的变化轨迹。在过去的几年里，成本逐渐地超过成本的上升部分是由于农作物补贴的突然解除和对各类生产价格的管制解除。这表明每单位耕地种植成本却是不稳定的。这表明了对于耕作棉花的农民群体福利的减少。根据以上对农户的调查数据，我们可多方面折射出农民总体福利下降的综合症状

这里介绍两个样本生产市场，它们都深受自由化改革的影响。而对于能源部门和信用市场，我在后面的介绍。

九、当地政治经济：自由化期间的产品和信用市场

Telangana在20世纪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农民反抗运动。第一阶段发生于1946至1951，这一时期政治之下，仍作为附属邦而处于英国的全面控制和影响之下。当地的农民发动了针对当时极度的封建压迫制度的反抗运动。运动的胜利成果是制定了废除封建压迫和对佃户提供保护的法律。第二阶段农民运动，目前仍在进行之中。这个阶段，早期的封建法律制度的残余被进一步清除。

尽管这些现象在其它地方会被更为详细的介绍[Sundarayya, 1972 and Pavier, 1981]，我在这里主要讨论自由化。在1950年以前，小生产者，不得不把他们绝大部分的辛苦所得付给国家和封建中间商。而在1950年的转变和封建力量的削弱，农民和乡村经济可以留下更多的收入所得。因此，在1950到1985期间，局促生产者的方向发展（来源：Reddy [1991] and NSS calculations above）。

然而从1985到2000年，市场化培育的程度已经迅速扩大，正如上面我强调的那样。这种情况不断削弱了市场中中介的作用[Vakulabharanam, 2004]。

这些中介商人提供大部分资金给农民，并从农民手中购买最终产品，从而获得其大块的收入所得。在Telangana不断提高的时候，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这些商人，也就是资金的提供者，他们在生产上农民仍控制着生产控制，但必须将产品销售给先前借钱的那些商人。考虑到这些，商人通常要求农民将产品，以销售给其他商人。

在20世纪80年代，当农民转向生产非农作物（主要是棉花），非农作物的价格不断上涨。自90年代引起的非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以及由于生产成本上涨导致的国内自由化，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